

罗马共和国末期盖乌斯·马略公共形象的理想化及其成因

刘小青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 作为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盖乌斯·马略在共和国末期的公共形象被高度理想化。在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中, 马略褪去了其作为政治领袖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戴上了伟人与完人的光环。他被视为伟大的将军, 杰出的人民领袖, 强有力的政治家。这一现象的出现, 是一系列现实因素与社会记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共和国末期的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与现实需求为马略公共形象的理想化提供了土壤; 马略本人举世瞩目的业绩、适时去世以及与苏拉长期敌对, 是其形象被理想化的重要因素; 共和末年民主化浪潮的兴起, 是马略公共形象走向理想化的加速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社会记忆的选择性、开放性与简单化等特性始终在背后发挥作用, 是马略完美公共形象形成的文化机制。客观历史、现实需要与社会记忆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盖乌斯·马略; 公共形象; 社会记忆; 罗马共和国

中图分类号: K125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2-0192-11



作为罗马共和国^①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盖乌斯·马略(Caius Marius, 公元前157—前86年)受到现代学术界相当程度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 英文学界出现了三本以马略为中心的传记, 分别由基尔达尔^[1]、卡尼^[2]以及埃文斯^[3]写就。虽然写作侧重点不同, 但他们的目标都是还原马略的真实面貌。此外, 《共和后期的记忆与领导阶层》虽然不是分析马略公共形象的专著, 但它创造性地运用了记忆理论, 指出记忆允许人们依据现实需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加工, 因而马略的公共形象并非固定不变^[4]。诚然, 形象学理论认为, 虽然以客观行为为基础的客观形象是历史人物公共形象的形成基础, 但是作为公众的一种“信念、观念与印象”, 公共形象同时具有主观建构的一面, 并随着时代与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而变化^{[5](2)}。因此, 对马略的公共形象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对不同时代史料的梳理表明, 同时代的苏拉

(Sulla)、卡图鲁斯(Catulus)、鲁提里乌斯(Rutilius)、斯考鲁斯(Scaurus)^{[6](233-247)}等以及帝国时代以普鲁塔克^[7]为代表的作家塑造的马略形象总体偏于消极。与之不同, 共和国末期西塞罗(Cicero)、撒路斯特提乌斯(Sallustius)、凯撒(Caesar)等人的作品中呈现的马略形象具有高度理想化特征。此外, 有异于马略时代资料的严重遗失与强烈的政治攻讦色彩, 以及帝国时代大部分资料由文人著就的性质, 共和国末期的资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 由于在时间上紧邻马略时代, 该时代的著述者亲历过, 或者无数次耳闻马略时代的事件, 因而他们的著述中多次涉及马略, 虽然这些史料分布较为零散, 但仍相当丰富, 从而使相关讨论深入展开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从记忆理论角度, 虽然相关著述属于个体记忆范畴, 但是由于著述者的身份与著述的性质, 使得这些个体记忆具备了社会记忆的属性^②。就身份层面而言, 这些著述者是活跃于政坛的精英分子。作为精通

收稿日期: 2019-09-05; 修回日期: 2020-04-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公职选举与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研究”(16CSS005)

作者简介: 刘小青, 安徽安庆人, 历史学博士,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古代罗马政治史, 联系邮箱: xiaoqingliu010@163.com

说服艺术的大师与具有政治诉求的政治人物，承载其记忆的著述必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特质。并且，他们的著述要么是发表于元老院、法庭或者民会的演说词，要么是抱有政治舆论宣传意图的小册子，皆具有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开性特征，因而在民众中接受程度相当高。虽然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再加工，但是也必须尊重民众对逝去不久的马略固有的记忆与理解。换言之，西塞罗等政治精英对马略的记述虽属著述者个体的记忆，但是其社会性特质突出，并且经过反复宣讲与广泛传播，已为罗马社会大多数成员所选择和接受。就此而言，他们塑造的马略形象已超出了个体的记忆与认知层面，俨然成为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中的公共形象。共和国末期史料的上述特征决定了还原马略的客观面貌具有难度，但也因此使分析与建构其在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中的公共形象成为可能。

基于此，本文的意图不在于考察与还原马略的客观面貌，也非批判西塞罗等共和时期政治精英或者普鲁塔克等帝国时期文人塑造的马略形象有失偏颇，而在于阐明马略在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中的公共形象本身及其成因。具体而言，本文从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以及凯撒等人的资料出发，试图首先探讨马略在共和国末年的公共形象，指出马略在共和末年被高度理想化为一位完美的政治领袖，然后分析客观历史与社会现实、马略个人的特殊历史地位、政治精英的价值与行为取向以及社会记忆等因素在马略公共形象理想化进程中的作用，最后从中透视客观历史、现实需求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

一、罗马共和国末期马略公共形象的理想化

事实上，由于《名人传·马略传》资料的系统性与文艺复兴后传播的广泛性，普鲁塔克笔下的马略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大致如下：侥幸获胜的将军、居心叵测的煽动家、蹩脚的政治家以及血腥的刽子手^{[8](925)}。然而，通过整理与分析共和国末期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凯撒等人的

著述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的认知中，马略的公共形象非但不具有这些浓厚的负面色彩，反而被高度理想化。他褪去了作为一位重要政治人物通常具备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俨然成为一位功勋卓绝的将军、杰出的人民领袖、强有力的政治家，几乎不会犯任何错误，堪称完人与伟人。值得指出的是，马略同时代的政敌苏拉、卡图鲁斯、斯考鲁斯等带有明显敌意的资料虽然在共和国末期尚有留存，但它们皆属于归隐后的回忆录，阅读范围仅限于极少的政治精英，也未进入当时的公共话语体系，并不反映当时罗马社会对马略的一般记忆与认知。这点从卡图鲁斯、斯考鲁斯等人的作品在共和国末期已经消失中可见一斑^[6]。因此，他们残存的著述并不影响共和国末期罗马社会对于马略的主流记忆与认知。大体而言，马略在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中呈现出下述理想化的公共形象。

首先，战功卓绝的军事领袖形象。普鲁塔克认为在军事方面，马略不过是一位粗鲁与狭隘的武夫，并对他的战绩持保留态度。譬如他认为朱古达战争取胜的关键是梅特鲁斯打下的基础和苏拉的外交才华，辛布里战争的胜利则主要有赖于卡图鲁斯，马略只是出于侥幸与偶然才取得结束战争的美名^{[7](10-27)}。但是上述形象并不符合共和末年公众对于马略的记忆与理解。

在共和末年人们的认知中，马略不仅具有一名优秀士兵所应拥有的全部技艺、力量与勇气，还有杰出的军事理论素养。西塞罗与撒路斯提乌斯都强调马略的意大利自治市出身及其少年时期在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严格训练，使他在力量与勇气方面表现非凡。西塞罗以马略曾在一次单打独斗中杀死一个可怕敌人作为例证^{[9](5,10,25)}。撒路斯提乌斯则借马略之口力言其勇武，“我可以摆出长枪、旗帜、胸饰和其他战利品给你们看。我还可以把我胸部的伤痕给你们看”，并且进一步强调，马略在晋升为指挥官后，仍能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10](348)}。在他们的描绘中，马略活力四射、朴实勇敢的卓越军人形象栩栩如生。

同时，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还认为马略具

有相当的军事理论修养。撒路斯提乌斯提到“杰出的军事教养”^{[10](322-323)}是马略的特征之一；西塞罗同样声称，马略只是对诗作等文雅领域缺乏兴趣与技能，而在军事知识方面堪称权威^{[11](20,47)}。并且，撒路斯提乌斯与西塞罗都强调了马略的军事素养来源于实践。西塞罗赞誉马略通过多次担任执政官、指挥战争“相当彻底与全面地学习和理解了关于战争的全部法律”^{[11](20,47)}；撒路斯提乌斯则借马略本人之口强调，“他们(指显贵)从别人的传述和阅读中才知道的东西，在我却是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他们从书本学到的东西，我却是从服军役中学到的”^{[10](345)}。

撒路斯提乌斯与西塞罗认为，马略出色的军事素养更体现在战绩上，是战绩使之成为伟大将军。马略在政治生涯早期就获得了一次超乎寻常的荣耀，“当他第一次向人民要求担任军团将领时，他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见过他；不过人们对他的功业却是熟悉的，结果所有的特里布斯一致投他的票”^{[10](323)}。关于朱古达战争的功劳归属问题，虽然苏拉等人有不同意见，但撒路斯提乌斯通过记载人民的反应来表明自己的看法，“……当人们宣告说努米底亚的战争已经结束而被捉住的朱古达正在被带到罗马来时，马略尽管本人不在场，却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并且把高卢行省分配给他。在元旦那天，他就任执政官之职并且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凯旋式”。接着撒路斯提乌斯又补充道，“当时我们国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了”^{[10](381)}。他的言下之意是，马略不仅具有结束朱古达战争的功劳，而且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军，只有他才能挽救罗马对外战争的危局，掌握着国家的希望与幸福。随后，马略确实不负众望，率领着罗马军队打败日耳曼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西塞罗在演说中屡次将马略誉为“伟人”与“国家的拯救者”，对此，他的听众大概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11](48)[12](9,20)[13](16,17-37)}。

其次，杰出的人民领袖形象。普鲁塔克认为马略出身低下、学养匮乏，使他与文雅的显贵圈始终格格不入，最终走向了煽动民众攫取权力的歧途，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家^[7]。然而，在西塞罗

等共和国末期的政治精英眼中，马略是一位杰出的人民领袖。虽然与普鲁塔克一样，他们也承认马略出身的低下与文化素养的匮乏，但是对他的价值评价截然不同。他们认为，马略奉行依靠民众挑战元老院权威的政治路线，虽然与他的出身与文化素养有一定关联，但是寡头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显贵阶层的狭隘排外应当负有更大责任^{[10](252,322)}。

马略的人民领袖形象更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在共和国末期的记述中，马略在公元前119年担任保民官期间，提出了一项缩窄投票通道的法律，目的在于减少显贵对于民众投票的干扰，保障秘密投票制度的真正实施^{[14](244)}。为了通过该法，马略不惜得罪其保护人梅特鲁斯和时任执政官科塔，初步显现了其人民派的倾向。

根据撒路斯提乌斯的描述，朱古达战争期间，马略与显贵彻底决裂，清晰地呈现出其元老院反对派与民众领袖的形象。该时期，马略以副官身份效力于梅特鲁斯，在获得一位预言者的鼓励后，改变了对自身仕途的期待，决意回罗马竞选执政官，但告假时遭到梅特鲁斯奚落与嘲讽，两人关系遂恶化。对此，撒路斯提乌斯明确站在马略一边，认为责任在梅特鲁斯，是他“目空一切的傲慢性格”在作祟，并且尖锐地指出“这乃贵族的通病”^{[10](324)}。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马略只能转向民众，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针对不同类型民众，他展开多种舆论宣传。“对于冬营里他麾下的士兵的纪律，他要求得不像先前那样严格了”；对于商人，大谈他对于战争的认识与结束战争的能力；对于梅特鲁斯，批评他“有意识地拖延战争，因为他是一个虚荣心极为强烈、具有国王般傲慢性格的人，因而特别喜欢玩弄权力”^{[10](324)}；“结果有许多人以高度称许的口吻支持马略竞选执政官”^{[10](326)}。到选举之时，“民众最后竟然兴奋到如此程度，乃至完全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维持生计与声誉的全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也放开了他们的本业来追随马略，把马略的成功看得比他们自己的需要更为重要，而这结果则是权贵被击败，经历了多年之后，执政官的职务终于授予了一位‘新人’”^{[10](332)}。可见，在撒

路斯提乌斯的描述中，马略深悉民众需求，精于舆论造势，赢得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热烈支持，成功突破显贵长期以来对执政官职位的垄断，委实一副挑战不合理政治秩序的人民领袖形象。从上述可知，在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看来，马略并不天然仇视显贵阶层，只是在受到不合理制度戕害时，才转向民众，并依靠自身努力赢得他们的喜爱与支持。

在撒路斯提乌斯笔下，马略的人民领袖形象在当选执政官后更加鲜明。一方面，马略继续发起舆论攻势，抨击显贵，取悦民众。他将对梅特鲁斯个人的批判升级到对整个显贵阶层，攻击他们傲慢虚伪、懒散腐败、奢侈堕落、无能贪婪，靠着祖先功绩取得高位，对于城邦和人民缺乏贡献，而他本人虽无显赫的祖先，但是过着诚实、节俭的正派生活，靠着劳苦与危险挣得功业，捍卫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撒路斯提乌斯在替马略撰写的演说词中，让马略强调其本人与民众是为一体的“我们”，而显贵则是“他们”。这一称谓本身就反映了撒路斯提乌斯对于马略人民领袖身份的明确定位^{[10](343-350)}。另一方面，在实际政治竞争中，在民众支持下，马略夺取了元老院原本授予梅特鲁斯的朱古达战争指挥权。为回馈民众，马略放低征兵要求，“允许任何人自愿参加军队，而他们大多数是无产者”^{[10](351)}。后来又分别与保民官萨图尔尼乌斯、格劳西亚、苏尔皮西乌斯结盟，并在萨图尔尼乌斯试图以激进手段威胁共和国安全之时，又以国家利益为重，果断镇压昔日盟友。对此，西塞罗在公开演说中屡次大加赞誉，称颂马略是将国家从危险的煽动分子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15](3,8,30,82-83)}。

简言之，在共和国末期的资料中，马略具有动员民众的口才与能力，依靠民众的力量，突破显贵阶层的阻挠登上高位，并且直接或者与保民官合作推动有益于民众的措施，致力于保护民众的利益免受权贵侵犯；当盟友走向极端时，又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断然采取镇压措施，化解了保民官对国家的暴力威胁。可见，虽然马略在挑战元老与贵族既定的秩序方面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但并不是危险人物。正是这一角色特征，马

略被定性为蕴含褒义的人民领袖，而非含有贬义的煽动家。

最后，强有力的政治家形象。基于对公元前100年流放事件与萨图尔尼乌斯被杀事件的分析，普鲁塔克描绘的马略缺乏政治才能，反复无常，受到民众与保民官的操纵，无异于他们的工具与牺牲品。故而，普鲁塔克将马略斥为蹩脚的政治家^{[7](26-30)}。共和国末期民众却认为，马略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能够引导民众、审时度势，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梅特鲁斯流放事件的起因是保民官萨图尔尼乌斯提出的一项土地法。对此，马略采取的策略是首先提倡元老们拒绝该法、尔后又突然转变态度加以承认，由此迫使梅特鲁斯不得不自我流放。据此，帝国时期的资料倾向于将马略理解为依靠保民官、手段卑劣的无能政客^{[7](21)}。然而，西塞罗的观点完全不同。在《反皮索》《为塞斯提乌斯辩护》等演说词中，西塞罗屡次指出其自身与梅特鲁斯的流放极为类似。他解释道，他选择接受克劳迪乌斯策划的流放，是因为克劳迪乌斯背后有凯撒与庞培的意志；梅特鲁斯被迫接受萨图尔尼乌斯策划的流放，则是因为萨图尔尼乌斯背后的马略因素。换言之，迫使梅特鲁斯流放的不是萨图尔尼乌斯，而是其身后更具影响力的马略^{[12](9,20)[13](16,37,17,30)[11](48)}。由此看来，西塞罗认为梅特鲁斯流放事件的幕后决策者是马略，他处于主导而非附属地位，更非萨图尔尼乌斯的工具。

对于萨图尔尼乌斯被杀事件，普鲁塔克认为马略在该事件中两面三刀，缺乏坚定立场，受他人裹挟而被迫采取行动，致使昔日盟友被杀身亡，此乃无能的、懦弱的背义之举，他也因此遭到权贵与民众的共同唾弃，名誉扫地^{[7](30)}。然而，共和国末期的著述指出，这是马略身为执政官主动履行职责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有力地保护了城邦免受煽动分子的危害。在《为米罗辩护》中，西塞罗两次将马略与罗马历史上其他著名人物并列，声称他们皆是通过消灭危险的煽动性分子为国家造福的伟人^{[15](3,8,30,82-83)}，并强调国内流血冲突虽然会给城邦带来危害，但有时却是维护城

邦的必要之举,米罗杀死克劳迪乌斯、马略杀死萨图尔尼乌斯皆是如此^{[15](5,14)}。总之,西塞罗认为马略杀死萨图尔尼乌斯是让城邦免受煽动与暴乱分子戕害的正义行为,且此举为他带来的是荣耀而非耻辱。

事实上,马略在公元前100年还实施了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即授予外邦人罗马公民权。西塞罗将这项政策的推动与制定完全归功于马略个人^{[11](48)},从侧面说明共和国末期大众认为马略具有独立施政的能力,而非蹩脚的政治家。在《为巴尔布斯辩护》中,西塞罗援引马略授予伊古维翁人(Iguvium)、卡梅里努姆人(Camerinum)公民权作为权威先例,热情赞颂马略,不仅将之描述为军事技艺精湛的指挥官,而且还是对于法律与历史先例有着丰富知识与高超理解能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即便马略的公民权法案超出了现存习俗和严格的法律条文,也应该被视为值得效仿的高尚之举。因为对于马略这样冠绝一切知识与实践的权威人物,人们不应有任何怀疑^{[11](20, 46-49,28,64)[9](2,3,90,209)}。由此,西塞罗等人建构了马略自主施政、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权威形象。

总而言之,在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中,马略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卓越才干的军事领袖,为罗马取得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保护了国家免受异邦的侵略;是一位杰出的人民领袖,依赖民众,维护民众利益,挑战元老院的权威并取得空前成就;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能够审时度势,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原则从事政治活动,在国家利益需要时行动果敢,镇压煽动与闹事分子,维护城邦秩序与稳定。概言之,在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中,马略的公共形象被高度理想化,几乎是一位伟人与完人。

二、马略公共形象理想化的成因

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将马略的公共形象理想化为一位完美的政治领袖,褪去了其作为政治家理应具备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虽然这一形象必定与历史上马略的客观形象有所出入,但是作

为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与社会现象,马略公共形象被理想化无疑值得关注与分析。大致而言,罗马人对过去的理解以及现实的需求是马略理想化形象诞生的土壤,马略独特的历史地位是其公共形象理想化的重要条件,共和末年政治民主化浪潮进一步拔高了马略的公共形象,在这一理想化进程中,社会记忆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最终,作为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马略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与伟人。

其一,共和末年罗马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与现实的需求,是马略公共形象理想化的根基。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一方面,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苏拉内战和独裁统治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灾难,成为难以抹去的惨痛记忆,始终刺痛着他们。另一方面,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危机并未随着苏拉逝去而解除,过去的创伤使他们恐惧类似灾难再度重演。因此,在清算苏拉政治遗产、预防灾难重演的迫切需求下,苏拉沦为共和国末期政治潮流中最大的反动角色。基于此,树立一位与苏拉对立的正面人物作为政治正确的象征成为时代需要。

共和国末期以内战与独裁拉开序幕。苏拉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末发动内战,自命为无限期独裁官,施行残酷的公敌宣告政策,肆意剥夺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16](47-87)}。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对时人造成的灾难与创伤之巨,没有任何政治事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即便在下一个时代即共和国末期,内战与独裁带来的混乱、暴行依然如同噩梦一样惊吓着罗马人。更重要的是,共和末年罗马政治未能走上一条健康平稳的发展道路,依然危机重重,尤其是随着权力逐渐集中于某些政治强人之手,罗马人深恐他们效仿苏拉从而导致相似的灾难重演。毫不夸张地说,对内战、苏拉独裁的记忆已成为共和国末期罗马人理解现实局势与防范惨剧再演的集体意识。公元前70年,庞培与克拉苏失和让罗马人惊慌失措,他们“痛哭流涕地请求庞培与克拉苏平息怒气,想想马略与苏拉斗争所造成的恶果”^{[16](102)};凯旋的将领与军队激发的不再仅是自豪与荣耀之情,还有恐惧与忧虑之心。譬如公元前62年,庞培从

东方凯旋前夕，关于他将效仿苏拉进军罗马的流言四起，人们惶惶不安。再如，公元前52年，元老院始终拒绝通过任命独裁官这一传统机制解决当前政治危机，宁愿创设一种全新而古怪的官职——“惟一执政官”来应对危局，足见他们对独裁官制度的恐惧与防范之情^{[16](121)}。可见，虽然内战与苏拉独裁已成为历史，但与现实仍高度相关，因此，每当危机来临时，共和国末期的罗马人都不断回首这段历史，警惕当年的灾祸再度发生。

事实上，苏拉甫一去世，罗马旋即清算他的政治遗产，将其新政一步步废弃。即便像庞培、克拉苏等苏拉手下的得力干将，执政时也纷纷走上了挑战苏拉体制的道路；自诩为反对派的雷必达、凯撒等人，更是举起了反对苏拉体制的大旗。由此，形成了清算苏拉政治遗产的风潮。在这种风潮下，苏拉的历史功绩逐渐为人们蓄意遗忘，他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则为人们强调，因此，在共和国末期，苏拉演变为暴政与恐怖统治的象征，人们纷纷与苏拉划清界限，仿佛与他的名字沾上关系就是政治不正确^{[17](3,2)}。

简言之，基于对刚刚发生的内战、独裁的理解以及对现实局势的担忧，清算苏拉政治遗产、预防苏拉再生成为共和国末期的政治中心任务与风潮。为了有力与系统地反对苏拉，预防相似灾难的再度上演，罗马人需要一位与苏拉对立的反对派领袖，以便在各个方面与苏拉形成鲜明对照。基于此，逝去的马略才具有了再度复活、登上理想领袖位置的机会。

其二，马略的特殊历史地位是其形象被理想化的重要条件。基于巨大功绩、与苏拉的长期对立关系以及适时去世等因素，马略在共和国末期被推崇为反对苏拉的精神领袖，得以被美化为理想领袖。首先，马略是共和国末期最知名的领袖。不论对马略作为的价值评判如何，都无法否认其史无前例的政绩与军功。他曾任七任执政官，创建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军队，为罗马取得对外征服战争与抵抗外族入侵战争的巨大胜利，结束了可怕的军事灾难阶段，成为当时最为出色的将军和受民众爱戴的英雄，这让他下一时代仍然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传播度，从而具备了被推崇为反苏拉派领袖的基本资格。加之马略出身新人，在获取权力的途径上，主要依靠自身努力与民众支持，而不是血缘与保护关系。在施政实践上，他对民众抱有善意，曾实施一系列有利于民众的措施，例如在保民官任上倡议通过缩窄投票通道的法案，保障民众投票自由；取消征兵财产资格，使无产者获得入伍资格；积极为老兵分配份地；等等，因而被民众视为领袖。与出身显贵、敌视民众、维护元老院利益的苏拉恰好位于政治天秤的两端。换言之，马略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出身、政治取向方面也与苏拉对立，将他推上苏拉反对派领袖地位顺理成章。其次，马略与苏拉长期敌对的历史事实为马略登上理想化政治领袖地位提供了合理性。苏拉曾经在马略麾下任职，权力与荣誉之争让他们走上相互仇恨的道路。马略极为憎恨苏拉与之争夺朱古达战争的荣誉以及东方战争的指挥权。同样，在众多政敌中，苏拉也最为仇视马略。公元前82年重掌罗马后，苏拉的行为清楚表明他最憎恨的敌人不是秦纳或者其他尚在人世的对手，而是逝世已久的马略。他不仅对马略家族的在世成员穷追猛打，还掘开马略本人的坟墓，鞭笞并毁弃其遗体，以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表达他对未能亲自杀死马略的愤恨^{[14](215)}。此外，他下令抹去罗马城中有关马略的视觉形象，以期将其除名毁忆。退隐之后，他依然不能释然，在回忆录中将马略的大部分功绩移至自己或者他人的名下，并攻击马略不仅是他本人的敌人，也是新城邦——他改革后的城邦的敌人^{[4](256)}。由此，作为苏拉敌人的马略，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反苏拉派精神领袖位置。最后，马略的适时去世有利于其理想形象的形成。虽然马略在内战中犯下不少暴行，但他于战争初期即公元前86年就溘然长逝。可以推测，如果他继续活着，势必会更深地卷入内战之中，犯下更多的暴行，成为无法掩盖的污点^{[4](256)}。然而，适时去世不仅使马略免于因施暴而遭受谴责，而且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或者被内战后期更多更血腥的暴力事件所稀释与掩盖，或者被顺利转嫁给替罪羊秦纳，从而对其形象的理想化没有造成实

质性损害。

可见,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及与苏拉的长期敌对,让马略登上了共和国末期反对苏拉的精神领袖之位。可以想象,人们将苏拉丑化为可怖的反面角色时,势必会将站在对立面的马略美化为伟大领袖;恰好马略又逝世于内战早期,避免了犯下更多无法弥补的暴行而有损其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略被理想化为西塞罗口中的“伟大的反苏拉者”^{[17](3,2)}。

其三,共和国末期民主化浪潮是马略走上理想领袖神坛的加速器。共和国末期以来,随着公民权向整个意大利的扩散、选举制度的变革以及公职竞争的日益激烈,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18](140-153)}。这一民主化浪潮为罗马政坛带来下述两点变化,使马略成为值得效仿与宣传的老一辈政治家,有力地推动了其理想领袖形象的形成。一方面,意大利新人对马略的主动效仿与推崇,进一步拔高了马略的形象。同盟战争后,意大利人普遍获得罗马公民权,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取得发言权,其上层人士也开始大量进入罗马政坛,跻身于以前对他们并不开放的元老院。这点从怀特曼梳理的共和国末期元老出身清单中可见一斑^{[19](209-279)}。但是,当他们试图在公职阶梯上更进一步时,却发现显贵阶层垄断着高级公职,将之视为禁脔,他人殊难染指。对此,意大利人非常不满,强烈希望打破现状。在上述背景下,与他们同样出身意大利自治市,但成功打破显贵阶层对高级公职的垄断并最终七任执政官的马略自然成为效仿榜样。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文提狄乌斯(Ventidius)无疑都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他们对马略抱有天然好感,将他视为成功挑战显贵排外特权的英雄,而非觊觎权力的暴发户^{[20](260-262,280-283)}。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甚至主动美化马略的公共形象。另一方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使众多政治精英为了取悦民众而效仿与宣传马略。随着共和后期民主因素的上升,民众投票自主性增强,政治精英的晋升也更加依赖民众支持。因此,他们不会像帝国时期的精英那样斥责共和制度,认为共和制度带来了无序与混乱,也不会鄙夷共和制下的民众为无法无天的

暴民。相反,他们乐于通过种种途径展示他们对民众的善意。苏拉以抑制民众权利、重建元老院权威为主旨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罔顾民意与历史潮流。因此,当他不得民心的统治结束后,新一代的政治领袖需要展示的是他们对苏拉及苏拉式统治的厌弃以及对共和政府与民众的支持。然而,当时尚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精英无法借助政党标签来宣扬自身的政治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苏拉反对派马略的赞誉、与他建立正面关联来彰显自身的亲民立场成为可行与明智之举。因此,他们对马略政治生涯中那些不光彩的事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回避。

确实,众多政治精英都在公开场合对马略赞扬有加,并试图与他建立正面关联。这些人中有凯撒、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甚至包含喀提林。譬如凯撒屡次宣扬其与马略的亲戚关系,并从中受益。在青年时代,通过恢复被苏拉推倒的马略的公共雕塑^{[7](5,6)},为姑母即马略妻子发表葬礼演说^{[21](3)},凯撒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赞誉;内战期间,正是由于与马略的密切关系,凯撒三次获得敌手阵营士兵的集体投诚^{[22](244,256)}。西塞罗利用同乡关系与马略攀上关联,在演说词中喋喋不休地赞扬马略的伟大^{[9](2,3,90,209,2,2,45,110)[11](28,64)}。喀提林则长期供奉马略曾经使用过的鹰标,并在反叛战争中将之作为鼓舞士气的筹码,充分说明他对马略的推崇以及马略在民众中的号召力量^{[10](176)}。恰如西塞罗所言,马略已经成为当前一代人集体效仿的榜样^{[11](21,49)}。正因如此,共和国末期政治精英集体选择对于马略政治生涯晚期尤其是内战期间的作为保持沉默,极大避免了给马略的公共形象蒙上污点。可见,共和国末期的民主化潮流促使政治领袖大肆宣传与赞誉马略,强化了人们对他的积极认知。

其四,社会记忆的选择性、开放性与简单化是马略完美公共形象形成的文化机制。共和国末期马略公共形象的理想化,虽然与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等历史书写者个人有直接关联,但是社会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理解机制始终在其中发挥作用^{[4](24)}。与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的

个体记忆一样，社会记忆虽然基于客观存在的过去，但是同样具有主观建构的一面，这决定了它会根据自身的理解与需求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改编与重组，从而呈现出选择性、开放性与简单化特性。正如诺拉所言，“虽然过去从来不是完全被重新发明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与社会面临的每个新挑战保持相关性与可理解性，过去就会产生微妙的变化”^{[23](7-24)}。换言之，在共和国末期的马略公共形象理想化进程中，社会记忆的特征始终发挥着重要影响。

首先，选择性特征让马略得以进入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的核心。如同人脑一样，社会记忆不可能全盘记住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只可能选择性记忆某些特殊事件，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成功或惨痛的灾难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成员的生活与心理，而且能为随后发生的相似事件或争论分歧提供借鉴与对比，警示人们预防同类灾难，从而对现实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那些没有直接后果的日常事件以及与现实不具相关性的事件则被视为不值得记忆的事件而被供未来使用的记忆库删除^{[24](5-7)}。很明显，在共和末年，史无前例的苏拉内战与独裁就属于上述的特殊事件，不仅给罗马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罗马人的生活与心理，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影响。因此，它们在共和末年的社会记忆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中心位置，成为罗马人理解现实与预测未来的重要依据，对于其他人物或事件的记忆都会围绕着它。正是由于与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的中心事件——内战与独裁以及其中心人物苏拉的密切关联，马略被社会记忆所选择，从而具备了被改编与重新解释的契机。换言之，马略进入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固然有其自身的缘故，也是社会记忆选择的结果。

其次，开放性特征使马略在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中的公共形象理想化成为可能。社会记忆的主观性决定了它具有开放性特质。与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不同，社会记忆并不追求按照细节与原貌对事件加以精确记录，还原真实可靠的历史。根据社会记忆理论，过去被唤起的原因不在于过

去本身，而是在于其对于现实的借鉴意义，以便让没有定论的、未知的未来变得可以理解^{[25](1-12)}。共和国末期，在反对苏拉及其政制成为当前政治中心任务的情况下，人们必然据此对于马略的社会记忆加以改编与重构。也就是说，人们对于马略的记忆关注焦点并不在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马略，而在于让其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反对苏拉及其政制的现实需求。很明显，一个正面的、积极的马略形象更适合反苏拉的现实需求，因此，社会记忆允许共和末年政治精英将描述焦点集中在马略人生中的辉煌时期，同时将那些不符合需要的细节加以改编，甚至对他在内战期间有损其光辉形象的事件直接避而不谈，以便将马略塑造成为与苏拉相对的理想领袖形象，从而服务于现实需求。

最后，简单化特性使马略的公共形象褪去复杂性与多面性，被单纯化为完美政治领袖。脑科学研究表明，相对于记忆历史事件全部与复杂的细节，人类的思维有一种将复杂的图景与印象进行简化的趋向，即在重新组织与贮存历史事件之时，不是将复杂事件的繁琐细节加以精确记忆，而是倾向于将之简单化，形成概念、象征或者符号，以便于记忆与传播。社会记忆同样具有上述倾向。事实上，对于关键历史事件的记忆，社会意识首先聚焦于原始事件或人物的类型，创造出方便记忆的概念、象征与符号，然后将细节填入其中，并视现实需求对原始事件的某些细节进行改编，从而创造出新的系统化的社会记忆^{[4](6)}。正是在简单化这一特质的作用下，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根据防范内战与独裁的现实需要，为了方便传播、记忆以及创造出戏剧性的对比效果，过滤了苏拉与马略作为重要政治人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将他们分别简单化为两种极端的象征与符号。其中，苏拉的功绩被蓄意忽略与遗忘，被简化为独裁恐怖统治、既定秩序与保守势力的代表和民众的敌人；相反，马略不光彩之处都被刻意回避，被简化为人民领袖与保护者、既定秩序与保守势力的挑战者、反对苏拉政体的先行者与楷模。由此，两者不复为具体而立体的历史人物，而是被分别置于价值评价的两端，概念化为

政治与道德取向的标签。

正是在上述社会记忆机制作用下,共和末年的罗马人对马略的记忆围绕着社会记忆的中心事件与中心任务展开了再加工的进程,其本质目的不在于还原马略的真实形象,而在于为现实需求服务。因此,社会记忆选择将不利于马略作为伟大反对者形象建构的内容滤除,只保留了那些有利于其光辉形象的部分,将之拔高与简单化,使之化身为卓绝的将军、杰出的人民领袖以及强有力的政治家。由此,共和国末期的社会记忆完成了对马略公共形象的重构,作为完人与伟人的马略就此诞生。

三、小结

作为对马略内在素质与外在行为的综合概括与评价,其公共形象同时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两个层面的内容。更为关键的是,由于马略属于上一个时代已逝的历史人物,共和国末期的罗马人对其公共形象的认知不能不受到社会记忆因素的影响。因此,共和国末期马略的公共形象并不直接等同于马略本来的历史面貌,也非马略所在时代的人们对他公共形象的认知,而是社会意识依据共和国末期这一特定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需求进行记忆与再认知的结果。

共和国末期社会记忆中马略完美公共形象的形成首先是以其客观成就与地位为基础的。很难想象,若非领导并取得对朱古达战争以及直接关乎罗马存亡的日耳曼战争的胜利,共和国末期的罗马人会对马略的军事素养与功绩赞誉有加;若非缩窄投票通道保障民众投票权利、取消征兵的财产标准、积极为退役士兵分配份地等作为,他也不可能被纳入民众派范畴;若非曾取得令人侧目的七任执政官的荣耀,共和国末期的政治精英也不会将新人出身的马略推崇为榜样;若非身为苏拉最痛恨的敌人,将马略推上反苏拉精神领袖的位置就缺乏合理性。因此,巨大功绩、政治取向及与苏拉的长期敌对是马略公共形象被理想化的客观基础。

然而,共和国末期的人们对于上一个时代的政治人物马略的记忆与认知既关乎历史,也联系着当下。在客观历史基础上,社会记忆展开了对于马略形象的再加工进程。并且,再加工并非是随心所欲或者漫无目的的,而是具有明确现实指向的。在共和国末期清算苏拉政治遗产、防范内战与独裁重演的现实需求下,罗马人对马略记忆的指向并非还原其真实可考的客观面目,而是塑造了一位与苏拉完全对立的政治领袖,以便更加系统地、有力地反对苏拉。由此,在社会记忆选择性、开放性与简单化机制作用下,马略在共和国末期的公共形象被拔高为理想政治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记忆对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再塑造进程可以持续进行。随着时间的持续推进,为应对新的时代需求与价值标准,社会记忆不断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加工与再解释,相关认知可能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就马略而言,由于共和国末期对内战与独裁的恐惧及反对苏拉政制的需要,社会记忆用回避劣迹、拔高功绩的方式对马略的公共形象进行理想化重构,塑造了一个完美领袖形象。然而,随着历史步入帝国时代,人们开始认为共和制度已不合时宜,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帝制取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苏拉、凯撒、屋大维逐渐被认为是推动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有功之士,而处在苏拉对立面的马略则被认为是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更为关键的是,帝制之下民众的政治地位剧烈下降,在共和期间被推崇为国家主人的民众转而成为受精英鄙夷的暴民,“好的保守,坏的激进”成为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被纳入“坏的激进”范畴的马略在帝国时期的社会记忆中呈现出消极色彩则成为必然。还需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持续向前,历史人物不断与现实社会相脱离,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与关注中淡化,甚至沦为故纸堆中尘封的过去。只有当现实需要时,人们才会再次将目光投向该段历史,相关的记忆才可能再度复活。对于马略的记忆同样遵循了这一规律。自帝国后期直到中世纪晚期,由于沦为与现实无关的、遥远的历史人物,马略便几乎从社会记忆与历史书写中彻底消失。直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种种

问题, 需要回望与借鉴古代希腊罗马的经验之时, 马略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总之, 以马略为代表的历史人物的公共形象是固定不变的客观历史事实与不断调整的社会记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这一形象并不完全符合人物本身的真实面貌, 但是作为一种客观现象, 通过追溯其社会记忆的形成和建构过程, 往往能够让我们对特定时代的个体或群体的经历和感受别有会意。正是过去与当下、事实与记忆之间相互作用, 历史才会超越时代, 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活力。

注释:

- ① 为了便于表述, 本文中罗马共和国末期指的是自苏拉独裁结束后至第二次内战爆发期间, 也即公元前 78 年到前 49 年; 共和后期指自公元前 133 年格拉古改革至共和灭亡近一百年的历史时期。
- ② 在记忆理论领域, 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 认为集体记忆是具有某种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它的存在和传承是以个体记忆为载体。然而, 芬特雷斯与威克姆为了强调记忆的社会性特质, 以社会记忆的概念取代集体记忆的概念。鉴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共和国末期罗马主流社会对于马略的记忆及其社会性功能, 因而采用了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关于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等概念的进一步说明, 请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参考文献:

- [1] CARNEY T F. A biography of C. Marius[M]. Assen: Argonaut, 1970.
- [2] KILDAHL P A. Caius Marius[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8.
- [3] EVANS R J. Caius Marius: A political biography[M].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94.
- [4] STEED K L S. Memory and leadership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D]. Dissertations & Theses: Gradworks, 2008.
- [5] 秦启文, 周永康. 形象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6] PETER H. Historicorum romanorum reliquiae[M]. Lipsiae: Kessinger Legacy Reprints, 1914.
- [7] PLUTARCH. Caius Marius [C]//PLUTARCH. Lives IX.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8] HORNBLOWE S, SPAWFORTH A.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9] CICERO. The second 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C]// GOOLD G P. Cicero Vol. VII.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0] 撒路斯特提乌斯.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M].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1] SALLUSTIUS. Bellum Catilinae bellum Iugurthinum[M]. Trans. WANG Yizhu, CUI Miaoyi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0.
- [12] CICERO. The speech in defence of Lucius Cornelius Balbus[C]// GOOLD G P. Cicero Vol. VIII.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3] CICERO. Against Lucius Calpurnius Piso[C]// GOOLD G P. Cicero Vol. XIV.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4] CICERO. In defence of Publius Sestius[C]// GOOLD G P. Cicero Vol. VII.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5] 西塞罗. 国家篇 法律篇[M]. 沈叔平, 苏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6] CICERO. De republica de legibus[M]. Trans. SHEN Shuping, SU L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2.
- [17] CICERO. On behalf of Titus Annius Milo[C]// GOOLD G P. Cicero Vol. XIV.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8] 阿庇安. 罗马史: 下卷[M].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9] APPIAN. Roman history[M]. Trans. XIE Def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7.
- [20] CICERO. On the Manilian Law[C]// GOOLD G P. Cicero Vol. IX.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1] 刘小青. 罗马共和国后期反选举舞弊斗争与共和国的衰亡[J]. 世界历史, 2016(3): 140-153.
- [22] LIU Xiaoqing. Anti-ambitu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epublic[J]. World History, 2016(3):140-153.
- [23] WISEMAN T P. New men in the Roman senate 139B.C-A.D14[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24] OSGOODO J.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5] 苏维托尼乌斯. 罗马十二帝王传[M]. 张竹明, 王乃新,

- 蒋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SUETONIUS. *De vita caesarum*[M]. Trans. ZHANG Zhuming, WANG Naixin, JIANG Pi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0.
- [22] 凯撒. 内战记[M]. 任炳湘, 王士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CAESAR. *De bello civili*[M]. Trans. REN Bingxiang, WANG Shiju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6.
- [23] 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J]. *Representation*, 1989(26): 7-24.
- [24] DENA E, NEAL A. Memory, constructed reality, and artistic truth[C]// EBER, NEAL A.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ed truths and competing realities.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2001: 5-17.
- [25] 彭刚.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J]. *史学史研究*, 2014(2): 1-12.
- PENG Gang. History memory and history writing: “Memory’s chan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ory[J].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 2014(2): 1-12.
- [26] 刘小青. 意大利人与罗马公民权: 从公元前 125 年到前 91 年[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9(3): 50-59.
- LIU Xiaoqing. The Italian and Roman citizenship from 125B.C to 91B.C[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19(3): 50-59.

The idealization of Gaius Marius’ public image and its ca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an Rome

LIU Xiaoq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tesmen in his time, Gaius Marius’ public image were highly idealized in the late Republican Rom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Marius, rather than a complicated and multi-dimensional politician, was endowed with the hue of a great man and a perfect man, considered as an excellent general,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the people and a strong statesman. The emergence of such a phenomenon resulted from both the social and memory factors. Firstl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nd the need of the times provided the fertile soil for idealizing Marius' public image. Secondly, Marius' own world-renowned performances, timely death and his long-term opposition with Sula were important factors. Finally, the rising of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the late Republican Rome served as the accelerator for Marius' public image to be idealized. And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such traits as selectivity, open nature and simplification of social memory, were all exerting their impacts from behind, functioning as the cultural mechanism in elevating Marius' public image. The objective history, practical need and social memory presented a complex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Gaius Marius; public image; social memory; Republican Rome

[编辑: 苏慧]